
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

李嘉谷

一、七七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随即中国政府派遣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考察苏联实业团”赴莫斯科求援。实际上杨杰率领的是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1937年10月下旬，苏联援华的首批飞机已飞抵中国，接着，苏联的飞机、大炮、战车、机枪、汽油等大批军火物资便陆续运抵中国。苏联还派遣军事顾问、军事技术专家与空军志愿队来华帮助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抗日战争前期，当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时，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作用巨大，它帮助中国抵挡住了日本的战略进攻，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中国的抗日战场而不能自拔。

但蒋介石对苏联的最大希望还在苏聟能直接出兵对日作战。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亲自召见派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时，指示：“其任务为促进苏联参战，所谓促成互助协定是也，其最低希望俾苏联源源接济我军用品，如飞机、高射炮、

唐〔坦〕克车、汽油等。”^① 这就是说，杨杰率团赴苏的任务不仅是争取苏联的军火物资援助，另一个任务，也可以说更进一步的任务，是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杨杰是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积极鼓吹者。据蒋廷黻的回忆，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杨杰就曾想用计谋逼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1937年5月，当蒋廷黻随同孔祥熙特使赴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杨杰建议蒋廷黻在伦敦对路透社记者公开宣布，苏联将在两周内参加对日作战。虽然这没有根据，可杨杰认为，一旦日本听到这一消息，就会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这样一来，就可促成苏联参战。但这一建议遭到蒋廷黻的拒绝。^② 显然，杨杰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七七事变后，杨杰对苏联参战更抱乐观态度，特别是当杨杰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一到莫斯科，便受到苏方隆重接待，苏方并“完全应允”杨杰提出的飞机与其他军火物资的援助要求，这使杨杰异常兴奋。他对这次赴苏使命的圆满完成毫不怀疑，以致完全不理会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不同看法。1937年9月10日，杨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大使来访，据称：苏联在不参战条件下，愿亟力援助中国。欧洲形势，英法美对苏仍抱畏忌态度云云。蒋昧于大势，……苏联方面对彼亦多疑虑。”^③ 9月11日杨杰的日记又写道：“关于进行第二步任务，拟向苏方先行提出开一航空路线及空中协定，以为互相协定之先声。”^④

当讨论远东问题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开会在即，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杨杰，要他探询苏联是否参加此次会议及对将来调解方案有何意见等问题，其中重要一条是探询：“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联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盼

① 杨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74。

② 见《蒋廷黻的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00页。

③ 杨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74。

④ 杨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74。

坦白相告。”^① 中国外交部也指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代表：“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② 关于这一问题，伏罗希洛夫的回答是：“参战是最大的问题。苏联是否参战与其时期，目前尚不能定。我是军人，应服从命令。至参战问题因与国际及苏联政治、经济均有关系，战略亦有很大关系。既是阁下提出，我当报告政府。俟政府决定后，再约时间告知。但可负责的声明，苏联政府与人民亟〔极〕端的同情中国。”这里，伏罗希洛夫虽未置可否，但显然否定的意味多。杨杰的日记记载：“予说将今日与阁下所谈情形，虽无结果，拟作一电报告蒋元帅。伏氏说，今日我所谈的话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亦无结果，可不必报告蒋介石，俟我政府决定后，再为电报悉，尊意如何。予答此电须拍出，因蒋委座竭念此问题之结果也。目下虽无结果，拟作一极简单之报告，只说所命各情，已据情与伏元帅作长谈矣。伏元帅称须报告政府，俟得结果再详告等语即可。伏氏说亦可。”^③

11月1日伏罗希洛夫约杨杰谈话。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参战问题〔为〕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苏联对于阁下所述甚表同意，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一作战，西方敌人也起来了。西东兼顾均无胜利把握，故苏联对于东西两方面均准备中。”杨杰说：“苏联尽说准备，不知何时始能准备完成。现日本原来计划以五个师或十个师之兵力，即欲将中国压倒屈服，以便全力对付苏联，今彼已将现役兵完全开到中国战线，……但未见中国有若何之失败。可见战争是一件不确实的赌博，日本蹈欧战中德国覆辙，明眼人已洞悉无遗。余认为此时是苏联唯一参战之好机，所谓天与之时。若苏联一动，日本必遭不可收拾之境遇，因之苏联可以奠定东方永久和平之基，如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1981年台北出版，第333页。

② 王宠惠致顾维钧等密电（1937年10月24日），见《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28页。

③ 1937年10月29日杨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70。

此则西方之敌人亦不敢正视苏联矣。良机易失，请鉴察焉。且中国连年多事，对于军需工业之建设尚未完成，故中国人之心理以为苏联必知道中国吸引日军主力之后，苏联必毅然参战共灭此虏。未知准备至何时方认为可以参战。”伏罗希洛夫回答说：“阁下洞察大势，明悉国际情形，令人敬佩。今天要向阁下声明一句话，苏联之准备亦快好了。”^① 当日，杨杰与张冲致电蒋介石说：“又养〔二二〕电（即前述 10 月 22 日蒋介石致杨杰电——本文作者注）所示第四项已得具体答复，伏帅深恐电报不密，职拟返京面呈。”^② 但杨杰并未回国，因此，至 11 月 12 日才致电蒋介石报告伏罗希洛夫的这次谈话，其中重要的话，即是“准备已快了”。但伏罗希洛夫仍说：“对于参战一节，个人极愿意，惟大计应决于政府。”^③

11 月 11 日杨杰、张冲同斯大林还有一次谈话。12 日杨杰、张冲致电蒋介石报告说：“史达林先生郑重答复职请苏联参战之谈话：1. 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其理由：甲、日本现在打中国是军阀之主张，财阀如三井、三菱等赞成之，但一般商业阶级、农民皆不愿意，因彼人民等认日军阀压迫中国，愈陷两民族于仇深似海也。乙、若苏联向日本开战，日人民必以为苏联亦系分润中国之利益者，刺戟日本国民之反抗，激成日全国民之动员，结果反助日本之团结，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丙、日本之政权操于广田，盖彼纯粹为法西斯主义与军阀结合，近卫不过傀儡而已。丁、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与日开战。戊、目前中国打仗，苏联当尽力帮助，若即时与日开战，必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④ 11 月 18 日张冲回国，自兰州致电蒋介石说：“本月蒸（即 11 日——本文作者注）晚职与伏氏宴别时，嘱转呈：‘如吾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

① 杨杰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〇一八，卷号 70。

② 《战时外交》(二)，第 334 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 336—338 页。

④ 《战时外交》(二)，第 334—336 页。

出兵，决不坐视。’”^①

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杨杰说：“张〔冲〕同志已到京晤面。对史、伏两公甚感。我军兹不得已决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援助，未知何时实现，盼转达详复。”^② 11月29日张冲直接致电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说：“现日本已尽其能竭其所有以扑中国，内部空虚已达极点。中国单独苦战已至艰险之境，敌军已迫近南京，只一百公里，种种情形已达公等十一日晚所谈出兵之条件，万恳从速出兵，使其进退失据，中国抗战之师从而牵制之，决不容其生还也。盼复。”^③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杨杰说：“刻德大使在汉奉其政府命令，传达敌方希望言和之意，并声称对华北并无领土野心，彼即将回京见余，有所面陈云。如其来时，必严词拒绝。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薄弱，恐难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④ 这里蒋介石表示决不同日本言和，但急盼苏联出兵。11月30日蒋介石并亲自致电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要求苏联“实践诺言”，立即出兵。显然蒋介石是根据张冲的汇报致电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的。因此，伏罗希洛夫非常生气。

据杨杰12月4日日记载：“正午伏氏约见，首述阁下所述已报告政府。兹将史及予二人复蒋公电内容告知，并称此电今日拍发，系由驻华武官转呈蒋公。电文另纸记录，即是一时不便参战，并声明所谈内容与十一月十一日面谈内容一致，与张冲所报不同，言语间颇以张冲所报告为不确实，大有恨张之表示。”12月5日，杨杰日记又载：“伏氏代表来，……最好请予再电蒋公声明，张冲所说不对（内容不拍亦可）。当面允之。遂致委座一电，详述伏氏之意。”^⑤ 但12月6日杨杰致电蒋介石仅说：“（一）钧座致史先生电已面托

① 《战时外交》（二），第338—339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37。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39。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37。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70。

伏帅代转；（二）伏帅所述如下：（甲）出兵问题非常重大，容报政府再达复，惟予个人意见，史先生于十一月十一日晚已郑重言之矣，因时机环境恐惹起全世界对苏联作战，刻只能尽量以物质力助我。”并说：“已默察苏于参战问题顾虑虽多，亦非绝对不可能者，愚见我若以资望素著之大员使俄，一面促成英、美、法对苏有相当之保障，环境演变，彼必自动出兵矣。”^① 杨杰此电未明说“张冲所说不对”。

12月4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拍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内称：“转蒋委员长：卅电悉。（一）苏联政府之方针：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是将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马上改善。……（二）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刻出兵，因为在该时，世界舆论要认苏联行动是保护法律及正义之当然的行动，而日本在该时不能自谓为被侵略之牺牲者，世界同情不归日本。（三）苏联政府之上述态度，只有苏联国最高苏维埃才能将他改为立即出兵的态度，而最高苏维埃会议最迟在月半或二月举行。”^② 因此，前述杨杰、张冲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斯大林说“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本开战”，可能也不是斯大林的原意，或是杨杰与张冲加进的主观意愿，至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12月4日给蒋介石的电报已作否定。杨杰在12月4日日记中对张冲表示不满说：“张氏急切好利，自作自受。”“此种妄人，竟充要角，能不偾事耶。”^③ 这是因为张冲以个人名义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将出兵的“诺言”，并以个人名义直接致电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要求苏联立即出兵。这在杨杰看来是抢了功劳，又办理欠妥。

实际上，关于苏联出兵事，伏罗希洛夫已经指出，应以斯大林

① 见《战时外交》（二），第469—470页。

② 见《战时外交》（二）第339—340页。原电未注日期。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70。

与伏罗希洛夫 12 月 4 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为准，并称与 11 月 11 日面谈的内容一致，其他说法均非原意。十几年后，蒋介石尚记着此事，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中说：1937 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开会期间，“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①其所述即指此事。不过张冲不是大使馆参事，而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副团长，斯大林 11 月 11 日接见的是杨杰与张冲，不是张冲一人。实际上苏联当时已否认有“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之类的表示，只是由于杨杰未按伏罗希洛夫的要求，明确向蒋介石报告这一点，因此，蒋介石一直认为苏联当时确实曾答应过参战。

关于苏联出兵消息的传递，蒋廷黻致电孔祥熙说：“政府似应注意两点：一、军国大事不能专凭口言，必须订有盟约，始足取信，口言最易误事。苏新大使抵任后，政府何不正式向其提议缔结盟约，彼之答复如何乃苏政府最可靠之表示；二、苏俄内外困难不少，即使彼有意参战亦须在数月之后，耿光次长等或过于乐观也。”^②后来蒋廷黻回忆说，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谈话，“杨获得（或许是想当然的）苏方的承诺，一旦日本占领南京，苏军对日作战。他对我说，他已将他伟大的外交成就电告委员长。我对他丰富的幻想力感到震惊。我电请委员长注意，请他不要完全采信杨的报告，否则会吃大亏。南京即将陷落之前，委员长为事实所迫，曾以个人名义致电史达林，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他的要求即是以杨杰所说的伏罗希洛夫的诺言为基础。该电发出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悉内情，直至李维诺夫把史达林的答复交给我，我才知道。”^③这里蒋廷黻有误会，显然杨杰是在莫斯科告诉蒋廷黻要电告蒋介石苏方已承诺

① 见该书第 87 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 年 9 月订正本。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三七，卷 2。

③ 见《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英文口述稿，谢钟琏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3 月出版，第 200—201 页。

一旦日本占领南京，苏联将出兵对日作战的消息的。但据档案资料，关于苏联出兵的事，是由张冲回国向蒋介石汇报的，因此，实际上直接导致这场“误会”的是张冲。

所以，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龙江(John W. Garver)说：“莫斯科时常故意地助长和利用中国人对苏联参战的希望。”^① 我认为这种印象多半是由于杨杰、张冲对苏联参战过于乐观，因而传递了不确切的信息造成的。苏联在参战问题上的态度，至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 12 月 4 日的电报已十分明确，不久并告以最高苏维埃会议也没有改变既定方针。但此后杨杰仍继续向蒋介石传递苏联会出兵对日作战的乐观消息，而中国政府也继续不断地向苏联政府提出出兵的要求，苏联方面的答复却依旧，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武汉、广州失守以后。1939 年 9 月 17 日出使莫斯科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致电蒋介石说：“苏对倭取严防痛击态度，但若倭知难而退，不再挑衅，苏只求保境息争，亦无与倭决战决心。故在远东，苏对美、英亦严防中计，不愿发动苏倭战争。我与彼接洽，切忌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②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与欧战爆发以后，杨杰还曾提出“促进中苏切实合作之管见”，其中列有中苏互助条约纲要条件六条，主旨旨在以大连、营口、旅顺、葫芦岛、威海卫、胶州湾租与苏联作为军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供给苏联军事运动，中东路并恢复“九一八”前之状况，以之换取苏联出兵。^③ 杨杰的意见未被采纳。

二、苏日中立条约的评价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便不断传出

^① 高龙江：《蒋介石要求苏联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谷世宁译，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第 119 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 431—432 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三〇一八，卷 48。

消息，日本将向苏联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并在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作外交报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完全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目的在减少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亦可为友，凡对苏联友好之国家，均可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①这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此后，中国政府已担忧苏日接近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1939年9月5日中国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说：“莫斯科路透社电称，苏、日有开始商议不侵犯条约之说，德国驻苏联大使正从中拉拢，最近曾与日本大使会晤三次云云。深望此说与苏德签订不侵犯条约前之传闻不同，完全不确，但切盼注意探查密报。”^②后由驻苏大使杨杰询问苏联副外交人员委员拉代夫斯基，拉代夫斯基否认此消息，说：“蒙伪边境事件，因日方请求停止军事行动，其性质正与哈桑湖相同。日俄悬案正多，如承租权、煤区暨渔业各项问题，皆为两国间悬案，如日方继续请求谈判，苏联亦可讨论，惟决不能违反中国之利益及危害中国之抗战。至不侵犯条约，目前日方并未提出。”^③但苏日接近的消息仍然不断传出，中国政府甚为忧虑。中国驻苏大使对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说，如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④直至1941年3月26日，也就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前夕，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还向蒋介石报告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的谈话，说：“职谓本人有一信念，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中苏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拉答：贵大使此种信念系以事实为根据，当然正确。拉态度诚恳，似无隐瞒。”^⑤

① 《战时外交》(二)，第345—346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三辑《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3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348—349页。

④ 《战时外交》，第383页。

⑤ 《战时外交》，第388页。

1941年4月5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中苏友谊的凝固性》的社论说：“在1941年内，在中国‘被侵犯与为本国独立而正在战争’的任何时期中，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亦必依然如故，决不变更。”其用意显然在不希望苏日接近。直至4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与苏联大使潘友新谈话时，潘友新还说：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而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招待。”张冲则对其表示：“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①但两天以后，苏日便正式签订了中立条约与宣言书。

4月15日苏日中立条约与宣言书全文见诸中国报端，各报同时“载文严词谴责苏联”。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也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象“晴天霹雷，使重庆当权者大吃一惊”，“在中国政界人士中引起强烈不安”。“蒋介石本人给人的印象也是惘然若失的样子”。但为继续争取苏联对中国的军火物资援助，“蒋介石政府决定不恶化同苏联的关系，把两国关系维持在现有水平上”。^②1941年4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本月十三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时所发表之共同宣言，内称日本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苏联尊重所谓‘满洲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碍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③4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电告驻美大使胡适：“日俄协定事，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

① 《战时外交》，第389页。

② 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莫斯科1981年版，第123、136—137、151—152页。

③ 见《新华日报》1941年4月15日第1版。

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① 中国政府对《苏日中立条约》本身的批评是十分缓和的，1941年4月15日《中央日报》第2版上发表社论《论苏日协定》说：“苏日协定，是两国间的事，我们原不必加以任何推测及解释，惟一九三七年八月所缔结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曾明白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缔约国之他方，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者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中国受暴日侵略，历四十五个月，已为举世所共知之事实，苏联政府及人民不但同情于我国抗战，且时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资上的援助，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似不应与侵略的暴日缔结任何协定，致于中国抗战有不利的影响。乃苏日协定竟成立于中国正在抗战的途中，而且在苏联累次声明反对侵略行动之后，这不免予中国国民以奇异的感想。”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已过50多年，今天人们完全可以从容讨论此事，对于条约的历史作用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历史的评价，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目前有一种观点，仅从“条约”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利影响着眼，认为“条约”表明苏联丢掉了反侵略旗帜，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倒退，使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而根本不提“条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所起的一定的历史作用。^② 我认为，对“条约”的评价不应局限于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利影响上，而应该看到，“条约”的签订，是当时苏联外交的一个胜利，因为它利用了并加重了日德之间的裂痕，因而当德国进攻苏联时，“条约”保证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而日本进攻苏联得以避免，使苏联在盟国的支援下能集中力量击败世界头号法西斯德国的进

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6页。

② 见陆文培《试论〈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攻,保证了对德战争的胜利,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全局意义的,同时最终也使苏联能于1945年8月挥戈东向,给日本法西斯以致命的一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日中立条约》有其一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然而,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这在当时与现在都是同样清楚的。当该条约签订十日以后,蒋介石向各地军政当局发出密电,对条约作了较冷静的详细分析,但说到条约所附宣言书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时,蒋说:“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论,苏日条约,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得〔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侵犯性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所不及,……故就此事而论,在苏联对我国不免损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①

现在我们来看《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过程。从1925年苏日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至三十年代初,苏联曾不断地主动向日本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但遭日本拒绝,而这次是日本主动提出同苏联签订条约。这是为日本的南进政策服务的。因此,日本希望同苏联签订的不是中立条约,而是互不侵犯条约。参加这次缔约谈判的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认为,中立条约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对互不侵犯问题说得不够清楚。但是苏联只同意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1940年11月8日苏联政府答复建川美次大使转交的日方提出的日苏不侵犯条约草案时,指出:如果日本政府不准备提出归还苏联早先丧失的领土——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问题,那适宜于讨论的是缔结中立条约,而不是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因为缔结中立条约时可以不涉及领土问题,只需就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租让权达成协议。^②显然,苏联在与日本签订条约时,对本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① 见重庆市档案馆藏: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24日),载《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2期。

^② 见C·A·齐赫文斯基:《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1期。

是有郑重考虑的，但正是这个《苏日中立条约》却在所附的宣言书中侵犯了第三国中国的领土主权。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及时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同时，中国的抗战也援助了苏联。1937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武官德拉特文谈话时说：“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就会把中国变为反苏基地，利用中国的一切资源、人力、物力去打苏联。”^①因此，当崔可夫来华任军事总顾问时，行前斯大林对他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②显然，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苏联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都是十分重要的。蒋介石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不顾苏联的实际处境，一再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苏联也应为缓和同日本的矛盾，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时，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做交易。很显然，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苏联便难以缓和同日本的矛盾。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不久便爆发苏德战争。中国保存的档案资料表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仍有军火物资输华，这证明苏联仍重视中国的抗战。但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已经蒙上了阴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莫斯科出版，第654—655页。

② 崔可夫著《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58页。